

戴季陶的社會革命觀，1919-1920*

施純純**

本文主要關注戴季陶於1919-1920年所提出社會革命的構想，以及其構想的特殊之處。如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論者所論述，戴季陶認為經濟結構的變革在社會革命之中佔有關鍵的地位。基於此，戴季陶指出中國社會受到資本主義衝擊而瓦解。在此衝擊之下，出現了大量失業、與倫理及社會關係喪失等現象。戴季陶指出中國社會的重整必須在接受機器工業生產力的經濟基礎上，以中國傳統倫理精神為其要素來重建新社會關係。同時資本主義已使中國內部產生階級分化，因此需要透過革命精英的領導，以勞動者生活的改善為前提，逐步提高勞動者的智識、另外活化其組織，以使其擁有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力量。本文提出戴季陶社會革命觀的特殊之處：一、他提出以轉化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修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缺陷的社會設計理念。二、戴季陶認為經濟基礎的變革雖然關鍵，但並不是所有中國問題的解答。他強調人的道德能力與其重建倫理、社會關係的責任。如此，戴季陶提出

* 本文在審查期間，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的寶貴意見，惠助本文的修改，在此致上個人誠摯的謝意。至於本文中所有不足之處，全責在我。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聯絡地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No.1, Sec. 4, Roosevelt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17, Taiwan (R.O.C.))

了一個同時回應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建立新中國社會的方向。

關鍵詞：戴季陶、社會革命、馬克思主義、倫理、中國傳統

一、前言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北京大規模逮捕學生的消息傳到了上海和其他城市，上海社會各界接連對於運動起了連鎖的反應。從知識分子到學生，然後到工商團體，最後及於勞工階層和失業的無產者均群起抗議。由於上海的動員的全面性，學者陳增燾將上海的五四運動稱之為包括了社會上各階層的分子的「真正的民眾運動」。¹其中，工人參與罷工的規模和政治影響尤其引人注意。一次大戰之後，一戰期間被歐洲工廠招募的中國工人在戰後回國，並帶回在歐洲參與或見證歐洲工人罷工的經驗和技巧，五四時期的上海罷工因而融合了舊的罷工方式和新的世界性意識。²因此，儘管傳統組織仍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上海罷工已然是國際勞工運動的一部分，工人亦作為新政治力量出現於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而工人作為新政治力量的出現，更意味著中國已經出現了「無產階級」一詞所對應的歷史現象。這既是中國處在世界資本主義之中的證明，也迫使知識分子理解資本主義已存在中國社會的現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等不再是遙遠的、不相干的詞彙。知識分子運用這些概念以表達每天上演的社會壓迫和衝突；同時，這些思想資源也被重新詮釋和理解，以作為中國問題和處境的解決方案。此外，面臨工人政治力量的湧現，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的關係重新成為當時受到討論的問題，支持群眾目標和促使群眾參與政治更是激進政治的關鍵。這些不同的層面構成了1919年整合社會和政治革命的新取向——將革命概念化為包含政治和社會雙重轉變的過程，並強調社會革命作為政治革命的前提。其中，隨著五四運動而快速傳播的馬克思主義，其社會革命的特殊之處，是強調經濟結構的重建是所有革命的關鍵。³

¹ 以上關於五四運動在北京和上海的情況，整理自陳曾燾著，陳勤譯，《五四運動在上海》（臺北：經世書局，1981），頁4、85-198。

²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72.

³ 上述關於社會革命的討論，整理自Arif Dirlik,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處於上海的國民黨人直接面臨上述的情況。⁴《星期評論》、《建設》和《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分別於1919年6月和8月創刊，⁵孫中山和戴季陶、胡漢民、朱執信等人，在這些刊物上討論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勞動問題、各種政治和社會議題、以及翻譯馬克思主義的作品。本文透過在當時國民黨論述中具有著重要角色的戴季陶，描述他的社會革命構想，以及其構想的特殊之處。

處於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城市——上海——戴季陶親眼目睹中國的社會問題和民眾運動的潛力，以及影響這些社會動盪的國內外因素。而馬克思主義的潮流，也提供戴季陶分析中國社會和理解資本主義的思想資源；並透過國際局勢和國際勞動運動的報導，進一步思考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趨勢和國際勞動運動的前景，以及中國在這兩大世界潮流中的何去何從。如此，戴季陶的社會革命觀，不僅聚焦於中國內部社會的轉變，還有中國自身變革與世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社會革命成為回應、反抗資本主義衝擊中國的方式。

許多戴季陶的相關研究中，尤其關注五四時期戴季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差異。⁶然而，考慮到馬克思主義各種版本的複雜性、五四時期各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4-72.

⁴ 1919年10月，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而本文處理的時間主要從1919年中至1920年中。考量政黨改組和行文之便，本文並不將孫中山、戴季陶等人稱為國民黨員，而統稱為國民黨人。

⁵ 《星期評論》於1919年6月8日正式發刊，前後出版54期，民國1920年6月6日停刊。《建設》創刊於1919年8月1日，前後出版13期，至1920年12月3卷1期後正式停刊。民國日報是陳英士為了進行反袁宣傳在1916年1月22日創刊的報紙，直到1923年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成立後，才正式有擴充該報為黨報的決議，1924年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決定由黨出資經營；在五四運動期間，民國日報只能算是國民黨人所辦的報紙。1919年6月16日，正式以白話的「覺悟」取代原有的副刊。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49、61-62、83-84。

⁶ 李占才，〈五四時期的戴季陶〉，《黃淮學刊(社會科學版)》，第3期(商丘，1992.03)，頁41-48；郭聖福，〈五四時期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研究〉，《學術月刊》，第9期(上海，1990.09)，頁73-78；孫語聖，〈淺析戴季陶「馬克思主義」兩重觀之原因〉，《咸寧師專學報》，第20卷第5期(咸寧，2000.05)，頁20-22；劉文麗，〈馬克思主義還是社會改良主義——再論五四運動後戴季陶的政治思想〉，《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第5期(北京，2009.05)，頁1-5；范小方、包東波、李娟麗，〈蔣介石

種思想匯聚的情況、以及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困難，即使當時中國的情境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流行的風潮，也不意味著知識分子們能夠毫無障礙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如同 Arif Dirlik 所說，包括戴季陶、胡漢民和李大釗，這些將唯物史觀應用於分析中國歷史的最初嘗試，首先是選擇性地使用馬克思主義，自由地將馬克思主義概念和出自其它來源的社會經濟概念混雜在一起；其次，他們主要聚焦於經濟失序和制度、思想變遷之間的關係，而都繞過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根本問題，尤其是階級關係在歷史中的作用以及他們的結構表達——這些概念不拘一格的使用，解釋了為什麼戴季陶、胡漢民、李大釗等作者，形式上都聲明忠於馬克思主義，但他們的分析並不容易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⁷因此，本文並不討論戴季陶有多大程度精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關注他在當時寬泛地被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假定下(經濟結構變革作為一切變革的基礎)，如何表述其關切的社會革命問題。

如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論者，戴季陶認為經濟結構的變革具有關鍵的重要性。基於此，戴季陶描述中國社會受到資本主義衝擊而瓦解，並出現大量失業和倫理及社會關係的喪失。中國社會的重整必須在接受機器工業生產力的經濟基礎上，以中國傳統倫理精神為其要素而重建新社會關係。同時，世界資本主義已使中國內部產生階級分化，因而需要透過革命精英的領導，以勞動者生活的改善為前提，逐步提高勞動者的智識和組織，以使其作為階級鬥爭的動力和新社會的基礎。

戴季陶社會革命的特殊性之一，是試圖轉化中國古代倫理精神作為新社會的倫理基礎，提出一比當前工業社會更具有適切社會生活的社會制度設計，以回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即使擁有強大的生產力，但其經濟壓迫和倫理敗壞的缺陷，顯示它並不是中國社會改造的理想範本。而另一個戴季陶革命觀的特殊之處在於，基於人的道德能力和重建倫理秩序

的國策顧問戴季陶》(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頁77-91。在上述的研究中，戴季陶對於俄國革命的態度是否友善以及是否贊同階級鬥爭，尤其是研究者關注、評價的焦點。

⁷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5-26.

的必要與責任，經濟基礎的變革雖然關鍵，但並不是所有問題的解答。如此，戴季陶既回應了資本主義，也回應了馬克思主義，而提出一個既發展機器工業生產力，又轉化中國傳統資源以建立新社會的可能性。

以下大體依循著 1919-1920 年戴季陶論著的時間順序，依次討論戴季陶如何理解世界資本主義對中國的衝擊(包含經濟、倫理、社會關係等不同層面)、中國如何回應這些衝擊、如何從世界局勢的判斷中找尋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式、以及與當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的相同和相異之處。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研究者指出戴季陶與國民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有其獨特的脈絡，⁸但指出戴季陶與李大釗的差異，並不意味著兩人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差異即「決定」或「代表」了國共後來的分合與走向。但這些差異的重要性在於，一方面顯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被運用來解答中國問題的複雜情況，從而避免以單一的馬克思主義解釋版本來判定政治立場的正統和異端。另一方面，在重要議題上的思想差異——中國傳統、階級鬥爭——不僅在當時的思潮中有其重要性，同時也有可能為不同的政治策略提供思想上的基礎。

⁸ Benjamin I. Schwartz指出，對於戴季陶和胡漢民來說，是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中民族主義的含意，以及關於一個掌握權力、有著高度紀律的精英群體的主張，具體化孫中山的精英理論，才吸引了他們。呂芳上贊同Schwartz強調民族主義因素的觀點，認為國民黨人雖然在五四時期一度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問題，但胡漢民基本上是將之作為學術研究的一個方向，對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並不贊同也沒有興趣，而戴季陶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為中國探索改革的方向。石川禎浩亦認為戴季陶、胡漢民等國民黨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目的是為了要將中國的社會問題防範未然，並將馬克思主義學說當作孫中山民生主義學說的科學根據之一來定位的。Herman Mast III則聚焦於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如何影響戴季陶對於五四時期群眾運動和反帝國主義議題的回應。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32.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頁304-305、315、317、555；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30-31；Herman Mast III, “Tai Chi-t’ao, Sunism and Marxism during the May Fo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Modern Asian Studies*, 5:3 (1971.07), 227-249.

二、資本主義的衝擊

1919年6月上海罷工後不久，藉著與孫中山的談話紀錄，戴季陶說明對於上海工人罷工的擔心。擔心的理由在於，這麼多無組織無教育無訓練又沒有準備的罷工，不但是極大的危險，對於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然而，工人直接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事既然已經開始，戴季陶認為有智識學問的人應該就要來研究社會問題、工人問題，就思想上和智識上來領導工人。⁹如此，戴季陶表達出他注意到中國工人的政治力量，但同時也認為這個力量是盲目和無方向的，因而需要領導這股力量至正確的方向。基於此，戴季陶亦開始探究中國勞動問題的性質和來源，並從中提出對於中國當代社會動盪的經濟分析。

1919年9月戴季陶著名的、被認為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一文，即從社會經濟的分析說明這羣無業階級遊民如何出現在當代中國。¹⁰所謂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戴季陶首先關注「社會生活問題」在中國的過去與現在如何產生。戴季陶認為，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是平等的、分工的職業區別，「不能說他是階級的區別」。然而，隨著私有財產的加大，「社會階級」也日漸擴大，構成「在政治上，治者階級和被治者階級完全分離；在社會上，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⁹ 季陶，〈訪孫先生的談話〉，《星期評論》第3號(上海)，1919年6月22日，3版。Herman Mast III和William G. Saywell認為，透過五四運動，戴季陶對於精英領導和教育羣眾的重要性，獲得更深刻的理解。Herman Mast III and William G. 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1 (1974.11), 82.

¹⁰ 許多研究者認為這篇文章是戴季陶對於唯物史觀的應用，包括戴季陶自己也在文章中提及「我們如果用馬克司的歷史觀察法來觀察中國的歷史，用達爾文生物進化說的法則來解剖中國的歷史，這些雜亂無章的事實，便都容易明白了」。此外，戴季陶將當代中國亂象歸因於歐美機器工業的觀點，也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參見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25-26；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頁311-312；Herman Mast III, "Tai Chi-t'ao, Sunism and Marxism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239-243. 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建設》，第1卷第2號(上海，1919.09)，頁11。本文所用的《星期評論》和《建設》雜誌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的合訂本。由於《建設》雜誌中每篇文章的頁碼都從1開始，因此本文註釋中所採用的頁碼，指的是該篇文章的頁碼。

完全分離」。尤其在宮廷奢侈、租稅加重、人口過多、天災等情況發生或是範圍擴大，這種社會上的「缺陷」暴露出來，於是便發生「革命」，革命的結果就是「治者階級的變異和貧富階級的轉換」。戴季陶總結中國歷史上許多次大小革命的事實，都是一種「階級的生活鬥爭」。¹¹

就戴季陶對於階級概念的運用來看，階級的定義主要基於貧富差距和政治權力的有無，是社會內部的「缺陷」，而非生產關係之中的位置。¹²因而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階級的生活鬥爭」並不是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動力，未曾動搖四民社會的結構，而僅改變了貧富和置換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因此，儘管有長時期的動盪、紛擾，但中國社會結構仍長期維持不變。

而當代中國所出現的社會危機則具有迥然不同的原因和性質：

古代的革命，是由政治上的聚斂所發生的生活壓迫，由宮廷的奢侈和官吏的貪婪等分配不平的事實所演成的階級壓迫——和自然力所演出的生活壓迫例如人口的過剩、天災、瘟疫等——兩件事做主因，沒有在生產方法上面發生出來的激變。現代中國革命的原因，就不僅是這兩件事了，最大的原因，就是歐美工業革命的果實。借著交通發達的力量，輸入到中國來，他們是用機器的力量來生產。中國是用手工來生產，一個人操縱機器的生產力，和一個人用舊式稼具的生產力比較，相差幾十倍或是幾百倍。……這一種莫大的生活壓

¹¹ 上述關於中國生活不安、社會動盪的來源，整理自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頁10-11。

¹² Ellen Meiksins Wood指出，實際上只有兩種從理論上思考階級的方式，將階級作為一種結構定位或一種社會關係。前者與更普遍的看法，是將階級看作「分層」(stratification)形式，根據「經濟」的準則——諸如收入、「市場機會」或職業——而有所差異；對比於這種地質學的分層模式，階級的社會歷史概念，即階級作為占有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關係，以Marx的話來說，取決於「從直接生產者榨取剩餘勞動」的特殊形式。如果第二種觀念是特指馬克思主義的，第一種則適用於從古典社會學到某些類型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廣闊的光譜。根據Wood對於階級概念的看法和戴季陶對於四民社會的分析，戴季陶當時主要將階級視為社會分層形式的結構定位，而非從生產者榨取剩餘勞動的特殊形式。而Herman Mast III亦指出，在這篇文章中，戴季陶對於階級概念的運用是模糊的，且未曾提及封建生產方式或生產力。上述討論參見Ellen Meiksins Wood,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6; Herman Mast III, "Tai Chi-t'ao, Sunism and Marxism during the May Fo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242.

迫，加到中國多數小民的頭上來，怎麼樣當得起。¹³

因而，中國所發生的社會現象，主要是從前家庭工業、徒弟工業和農業生產者受外來機器製造品的壓迫而失業，新工廠又未能吸收，既有別於傳統四民社會的天災或政治，也不同于歐美「農民的工人化」、「直接生產的工人的奴隸化」、「中流階級的平民化」。¹⁴當代中國處於外來生產力瓦解了原先的社會結構，但內部尚未完全接納新生產方式、新社會尚未建構完全的時刻。在這個時刻中，大量因此產生的失業流民，常流於兵匪，構成以武力維護自身生存為最高目的的「武人政治」，¹⁵構成另一個當代中國政治上的亂源。

為處理失業以及伴隨著失業而來的問題，戴季陶並不認為應排除、拒絕機器工業而回到傳統四民社會，而是強調應在接受新生產力的前提下進行社會改造。基於科學的進步是世界國家和社會改造的總動力，「以科學的發達為基礎的世界的國家及社會的改造運動」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孫中山的實業計畫、機器借款、交通建設等，就是解決外來機器生產品壓迫的生活不安的切實方法。¹⁶如此，科學、工業、交通等新生產力的接受和發展，成為戴季陶解決人民生計問題、重建社會的關鍵。

然而，中國社會的整合與改造並不僅僅是發展實業即可，中國仍需克服許多障礙以及建立發展實業的制度條件。戴季陶描述中國井田制度的破壞、私有財產的產生等經濟結構上的變化，導致中國秦漢以來法律系統具有保障私有財產、保障特定身分的特徵，並認為這一法律系統的特徵不僅阻礙了企業的大規模發展，也加劇了失業問題：¹⁷

¹³ 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頁7。

¹⁴ 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頁6。

¹⁵ 戴季陶指出，生活的落伍者的匪透過兵的組織，侵進了「治者階級」裡面來，治者階級裡面的無力者和反對者漸漸失了勢力，除了能為兵謀衣食住供給的和供給兵的智慧的人而外，都被兵的勢力排除在治者階級以外；於是政治組織便成了武人、官僚、政客狼狽為好的一種最惡劣的制度，政治上的最高權便落在武人的手裡。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頁11-12。

¹⁶ 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頁17-19。

¹⁷ 戴季陶曾於1919年8月17日的《星期評論》，提到胡漢民認為中國經濟制度上的最大變遷，是中國井田制度的破壞，以及所引發的社會制度等其他部分的變遷。考量時間上的先後順序，戴季陶對於中國秦漢以來法律維護私有財產，而私有財產又得自

有資本的人何嘗沒有？銀子很多甯可拿來藏在地裏，或是出了棧租去放在倉庫裏，不願意拿出來做「企業的資本」。卻是經營企業不經營企業，是他的自由，他的所有權，是神聖的，別人不能夠對他請求？他處分所有物的自由，也是神聖的，又誰人能夠對他要求工作的權利？因為如此，所以許多人的勞動機會，也就沒有了。不勞動不能生存，社會的生存機會應該是平等的，社會的勞動機會，也應該是平等的。但是在今天的社會狀態上，並不是窮人不盡勞動的義務，是他沒有勞動的權利。¹⁸

在戴季陶看來，私有財產的保障引導出企業經營的自由，但企業經營的自由卻反而使有資本的人可選擇不經營企業，因而加劇了失業的嚴重性。因此，基於國家存在的意義是「在國民全部個體生存和種族生存之社會的意識」，保障私有財產的法律缺陷應該要被改革。¹⁹而戴季陶提及中國秦漢以來的法律系統加劇了當代的失業問題，也再次顯示在當時的中國，失業是一個包含了社會、經濟、法律各層面的嚴重問題。

而其他妨礙中國社會重建的因素，有鎮壓新思潮的舊軍閥勢力，亦有社會解體受害者的盲目反應——本應最具備「革命」動機但實際上常流於兵匪而支撐著舊軍閥勢力的失業遊民。戴季陶指出，許多因社會缺陷而生活困苦的人，因身心的缺陷、對於革命認識力缺乏、道德的基礎及理想的構成薄弱，從一切兵禍匪亂的原因，可知這些人最容易贊同革命運動，也最能夠反對革命運動，是最要解決最難解決的大問題了。²⁰換言之，即使社會的缺陷、羣眾的處境均具備了社會改造的條件和動力，在缺乏意識和理解的情況下，羣眾的強大破壞力量未必能投向正確的方向，反而可能作為社會改造的阻力。因此，即使羣眾的生活不安構成了社會改造的條件和目

井田制度破壞的觀點，可能來自於胡漢民的影響。季陶，〈隨便談·一個新研究〉，《星期評論》第11號(上海)，1919年8月17日，4版；季陶，〈「法」的基礎(上)〉，《星期評論》第13號(上海)，1919年8月31日，1-2版。

¹⁸ 季陶，〈「法」的基礎(上)〉，2版。

¹⁹ 季陶，〈「法」的基礎(上)〉，2-3版。

²⁰ 戴傳賢，〈革命？何故？為何？〉，《建設》，第1卷第3號(上海，1919.10)，頁17。

的，但關鍵並不在羣眾的自發性，而在於具備革命精神的「革命者」。²¹

如此，戴季陶描繪出一個受到外國機器工業製品衝擊，破壞農業、手工業的生產方式而出現大量失業的當代中國社會。雖然認為中國的科學和實業是吸納、安置這些失業遊民最根本的辦法，但中國傳統法律對於私有財產的保障妨礙了實業的發展，因而加劇了失業的情況；而生活困苦失業遊民，在受到正確引導之前，正流向兵匪軍閥而內耗著中國。接著，戴季陶進一步從倫理和社會關係的層面，描述中國古代倫理崩解的過程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缺陷，並提出一個理想社會的輪廓，以及中國社會重建的可能性。

三、倫理的崩解與重建

1919年10月和11月，戴季陶發表〈舊倫理的崩壞和新倫理的建設〉，詳細地描述中國倫理和社會關係解體的過程、中國古代倫理無法恢復的原因、以及新社會倫理的重要性。指出中國除了經濟層面的變革之外，倫理、社會關係的改造也至關重要。戴季陶首先指出「倫理」的重要性，將倫理定義為「人類之社會生活的共同規範」，並從進化論的角度描述倫理內容隨著時代變遷的特性：

人是進化的，社會也是進化的，所以倫理的規範，也一定是進化的。就個體說，個體的生存意義，是在個體的保存和個體的發展上。就羣體說，羣體的生存意義，是在羣體的保存和羣體的發展上。羣體是個體的總合，一切個體，都是為羣體而生，羣體也是因個體而有。……在這一個羣體的生活當中，各個體相互間、個體與羣體間、一羣體與他羣體間的共通生活規範，就是倫理。所以倫理的基礎，是在「全人類之社會的生活」上面，拿這一個話來作標準說，倫理的標準，就是「適於全人類之社會的生活與否」的問題。²²

²¹ 戴傳賢，〈革命？何故？為何？〉，頁22-23。

²²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上)〉，《星期評論》第20號(上海)，1919年10月19日，1版。

戴季陶未提到個體發展與群體生存之間是否有可能產生衝突，或個體因衝突而產生均衡的可能，而僅提到個體與群體之間互相依賴、互有責任的關係。因為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不可分，倫理的重要之處在於界定個體與群體之間適切的生活規範。然而，人的社會生活並不會有個永恆的、完美的倫理規範。隨著社會的「進化」，倫理內容也會隨之改變。戴季陶接著從中國的歷史經驗，說明社會進化與倫理內容隨時空變換的過程。

戴季陶從中國舊日的社會關係談起，指出中國古代的社會關係不外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父子、兄弟、夫婦構成中國的家族關係，而維持這普遍的家族關係的道德標準，就是孝慈、愛敬、倡隨等尊卑道理。而由家族合成國，各國相對立，便構成天下。以農業為主、工業為副的生產，是中國古倫理社會的經濟基礎。戴季陶認為，一切生產都是家族的生產，分配也是家族的分配，工業用的器具都歸各家族的自己所有，因而這一種經濟組織的時代，就叫做「家族自給經濟的時代」；而在這一時代中，只要家族關係能夠和諧，在交通不便與物產交換有限的情況下，「家長權變的君權」維持全社會的消費分配，加上小範圍的友誼關係，群體的生活就可以圓滿了。²³

由此看來，中國古代社會包括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基礎、以家族為主要社會關係，以及在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和道德。這些不同的層面組成一個完整的社會，呈現「中國傳統」的不同面向。然而，隨著「物質文明的進化」，古代倫理逐漸崩解：

物質文明的進化，由自給經濟的時代，進到交換經濟的時代以後。社會的組織，便形成交換中心的形態，商業交換的行為，漸漸的離開了農工的生產而獨立。交換經濟的範圍越加擴張，貨幣的用途越加廣汎，商業營利行為的勢力，越是加大，自給的農業經濟基礎，就從這裡發生破綻。因經濟的財產兼併，便發生政治的國土兼併，於是社會成員各個人的人格，成為私有財產制的從屬品。一切舊日農業自給經濟制度下面的倫理關係，在這私有財產的交換經濟制度

²³ 上述關於中國古倫理的描述，整理自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上)〉，1版。

下面，便失了存在的勢力。孔子作春秋，就是在這個時代。孔子當時的目的在甚麼地方呢？是在恢復古代的倫理。……直到今天，古倫理的規範，只是靠著鄉間農家實行(因為鄉間有許多地方，還有家族的自給經濟制的存在)和一般士大夫口頭傳播。……拿著一張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已經感受不能兌現痛苦的古倫理支票，走到今天這個科學發達的機器生產時代的世界上來。要叫人家給他兌現，這那裏做得到呢？²⁴

在上述引文中，經濟型態的變遷為舊社會社會關係、政治、道德變遷的根本因素。戴季陶指出，中國社會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商業化和私有財產制度的出現主導了其他社會層面(道德、社會關係)的變化；古代的家族社會關係和倫理被削弱或破壞了，連社會成員的人格都成了「私有財產的從屬品」。孔子在幾千年前企圖恢復古代倫理的嘗試，因經濟基礎變遷而不可能成功；而等到科學發達的機器生產時代來臨之時，古代社會關係和倫理的崩解更加不可逆轉。由此可知，在戴季陶的想法中，由於缺乏相應的經濟基礎，中國古代的社會關係、古代倫理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而古代倫理在當代的殘存，僅見於鄉間農家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當物質變動呈現了階段性、方向性和不可逆轉的態勢，那是否科學發達機器的生產時代，會因經濟型態的改變而產生新的倫理？戴季陶指出，物質的進步逐步削弱、破壞、甚至摧毀了中國原本的倫理和社會關係，但工業時代的新倫理並沒有隨著經濟變遷而自動產生：

那時候的交換的商業經濟，雖是破壞了自給的農業經濟，破壞了家族協作的制度，但是家族制度的遺骸，仍舊靠著私有財產制維持其存在。家族的制度，並且推及於徒弟工業及徒弟制的商店組織。古倫理的規範，大家對於他，都取一種利用主義，用利己的意思去解釋他。甚至連父母的屍體，也可當作營利資本，已死的兒女，也可以納采結婚。由古倫理的崩潰，更反對的產出以古倫理為依據的迷信來。這一種古倫理的迷信，也可以依附著以男權的家族為單位的私有財產制和家族型的工商業組織，發生社會的規律力。自從由近

²⁴ 引文中的括號為原文所有。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上)〉，1版。

代的科學發達的結果，生產手段，完全變更。使用汽力電力的工業製造，便把以男權的家族為單位的私有財產制和家族型的工商業組織，也打破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工商業制度，一天一天發達；無產階級的範圍，一天一天的擴大；無產階級的家庭生活及家族的團結，一天一天的破壞。……我們再反過來替那些資本家階級的人想一想，他們怎樣呢？在經濟上他們是很滿足了，但是在倫理上，他們何嘗得了半點的滿足。²⁵

戴季陶以上海一位實業家為例，這位實業家天天查帳以防兒子亂用他的錢，他一個兒子為了不讓他查帳而用石灰弄瞎他的眼睛；此外，不只是中國，在外國的無產階級，也因經濟上的困難而無法過上倫理生活。²⁶因此，就戴季陶來看，機器生產方式確實在經濟上帶來了一個新的時代，但卻沒有提供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個「適於全人類之社會的生活」的倫理內容。經受交通和近代工商業影響的地區，物質文明的進化並不會同時帶來社會生活的舒適與幸福；社會生活的適切與否，也無法僅以物質進步來衡量與決定，更不會同時隨著物質的進化而自動到達更美好的境地。因此，物質文明的進步對應著倫理的敗壞，成為兩個相反的社會變遷方向。

面臨新倫理無法隨著機器生產時代而自動出現的情況，戴季陶指出，「古倫理的崩壞，是他自己崩壞了的，不是我們要去破壞他的。現在我們建設新倫理的必要，已經逼到我們自己生命裡來了」。²⁷且由於「我們今天卻是仍舊要做人，仍舊要做社會的生活，我們仍舊需要這『人類社會生活之共通規範』的倫理，所以我們就不能不建設新倫理的基礎」。²⁸換言之，即使中國古代倫理隨著經濟變遷而破壞的過程並非人為導致，但由於經濟變遷無法自動提供適切人類社會生活，戴認為新倫理必須而且能夠由人自己

²⁵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二)〉，《星期評論》第25號(上海)，1919年11月23日，1-2版。

²⁶ 戴季陶指出，外國地下室裡住的工人，夫婦都整個大夜跑去跑出去作工，剩了兒女在家裡，往往有很小的兄弟姊妹通姦的事情發生出來。上海地方，靠賣淫過生活的女子和靠他人賣淫來養活的男女，直接算起來，總是好幾萬。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二)〉，2版。

²⁷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二)〉，2版。

²⁸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上)〉，1版。

界定並建設的。由此可知，對於戴季陶而言，倫理雖然依據經濟變遷而變化，但有可能不是經濟變遷被動的「反映」。新倫理可以在特定的經濟條件下，由人主動介入、設計、建設得來。

而理想的、建立在新物質基礎上的「新倫理」應該是什麼呢？在 1919 年 8 月的〈隨便談〉，戴季陶提及中國民族的道德觀，認為中國人有很多好性質，例如「放生」的行為，良心上的動機就完全在「仁」的觀念，可以說是「愛的極致」。戴季陶認為，如果能夠把這種道德的精神，用近代科學的文明作為材料而建設起來，「不但是一個民族的幸福，簡直是世界全體人類的幸福(福)了」。²⁹在同時間的另一則〈隨便談〉中，戴季陶認為「孝」、「慈」是中國倫理上最要緊的事，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是「中國古代倫理的極致」；所以中國古代人的理想並不是「個人主義」，並不是「家族主義」，的確是「社會主義」。³⁰而在 1919 年 11 月的〈舊倫理的崩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一文，戴季陶更詳細地提出兼顧「個性的發展及社會的發展」的新倫理觀——仁愛——透過包括共作(分工的協作)、共養(老幼)、共濟(廢疾死亡)、共愛(性的自由)、共樂(美術及運動)、共治(全生產的分配)等具體措施，期望達到以「全社會養全社會的父母」，「全社會撫養教育全社會的子女」，並「合了全社會的兄弟姐妹的協作，來分工做社會的生產」。³¹

既然強調人口、生產、智識都無法回到過去，「今天萬不能夠恢復三千年前的舊倫理」，³²卻將新倫理置於「仁愛」的原則下，這是否矛盾呢？就〈舊倫理的崩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一文所描述的仁愛觀的社會具體措施來看——以社會為單位的共作、共養、共濟、共愛、共樂、共治——顯示新倫理的內容與在家族為單位實踐的孝慈、愛敬、倡隨等古倫理的具體措施並不相同；但在這些不同的內容背後，戴季陶卻也提出了設計的理念和主張：

我們要曉得，我們不是不應該對父母盡孝；要曉得在今年這樣經濟

²⁹ 季陶，〈隨便談·中國民族的道德觀〉，《星期評論》第10號(上海)，1919年8月10日，4版。

³⁰ 季陶，〈隨便談·孝慈〉，《星期評論》第10號(上海)，1919年8月10日，4版。

³¹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二)〉，2版。

³²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二)〉，2版。

發展狀態的下面，要一個人完成一個人的孝，是完成不來的。我們也不能學孟軻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是要五百年興一次的王者才能夠有的態度。我們只有「老全社會的老」，就是合全社會的力量，養全社會的老。我們不是不應該慈愛自己的子女；我們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子女，教與育都做不完全的。一定要合全社會的力量，「幼全社會的幼」。我們不是不要友愛自己的兄弟；是要友愛全社會的兄弟。我們不要束縛性能，要破除性的階級和人格獨占。我們不是要侵奪他人或被他人侵奪，是要各盡所能、各取所需。³³

因此，孝、老、幼、養、友愛等原本實行於中國家族制中的倫理規範，在新社會中仍有執行的需要，也可以有新的執行方式。透過全社會的力量，不僅可以彌補個人在當前經濟條件下執行倫理規範的能力不足，並可以將古代倫理理想以新的方式實現於社會之中。此外，在新的時代中亦有新的倫理內容，例如性的自由(共愛)、全生產的分配、美術和運動(共樂)等，戴季陶也將之歸於仁愛精神的範圍之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遷，戴季陶不僅賦與古代倫理精神新的具體措施和執行的力量，也有新的內容和作用。³⁴

因而，雖然中國倫理和社會關係的瓦解源自於經濟的變遷，但社會改造的工程卻無法僅止於工業發展的經濟層面而已。新倫理和新社會關係並

³³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二)〉，2版。

³⁴ 呂芳上指出，戴季陶在經濟決定論的影響下，認為經濟組織的變遷不能不影響倫理關係的變化；而由於傳統中國社會主要單位的「家族」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個人與社會的直接聯繫，個人融入了「大我」的社會中，呂芳上認為這與沈玄廬以「互助」思潮為出發點的「子孫主義」，和以「愛我的子女就是愛『人』」，以全人類自然的愛，包孕全人類的新倫常觀念，實相一致的。然而，就沈玄廬以「互助」為出發點的「子孫主義」來看，實根據「世界的趨勢」，而非中國傳統。根據沈玄廬1919年7月20日的〈子孫主義〉一文，沈認為：「子孫主義的裡面，應當改革種種、即是說中國人只知道豎的『傳種』，不知道橫的『互助』；……世界思潮，已竟湧現了一個『互助』的真理，任我中國人既不能違反真理，『倒行逆施』。便應當吸收這種思潮，把狹義的片面的子孫主義，化為廣義的普遍的子孫主義。」由上述引文可知，沈玄廬認為應以世界潮流的「互助」來改革中國只知「傳種」的狹隘子孫主義。與此對比，戴季陶卻認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國古代倫理的極致」。這顯示沈玄廬與戴季陶即使有著相似的理想社會形貌，但理想社會的新倫理精神卻具有各自不同的來源。沈玄廬，〈子孫主義〉，《星期評論》第7號(上海)，1919年7月20日，3版；季陶，〈隨便談·孝慈〉，4版；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頁234-236。

不會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自動產生，而是必須由人主動依據倫理的精神而規劃創造。雖然中國無法迴避接受機器工業的命運，但戴季陶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壓迫和物質利益導致道德墮落的批判，顯示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並不是中國社會改造的理想範本。中國在接受經濟的必然性之外，仍可以著力於非經濟領域的倫理與社會制度設計，仍有社會制度的選擇空間。而中國古代的倫理精神能夠透過轉化而保存，並且透過新措施與社會力量的執行，提供一比當前資本主義社會更適合人生活的理想社會藍圖，從而成為中國修正工業社會弊病、回應資本主義的方式與方案。

從這個角度來看，戴季陶認為中國傳統確有值得保存的部分，這些部分與中國的現代化不僅合拍且有所幫助。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濟進化有其必然性，人們必須接受機器工業必然到來的命運。但機器工業的物質進步卻無法帶來適切的社會生活時，運用中國傳統的倫理精神設計新社會的非經濟層面的具體制度、措施，戴季陶不僅認為這是可能的，也是迫切而重要的。因而在戴季陶的思維中，既無需打倒、批判所有中國傳統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前提，³⁵也不需完全以西方文明為標準來篩選中國傳統的價值。³⁶

雖然建設新倫理是要緊的，然而，當前的中國尚未到達新倫理完全建立的時刻，當前的中國社會還沒有能力執行上述的倫理任務，戴季陶也不認為重建倫理的努力能夠僅依靠一個人、一國或一民族，在很短的時間內

³⁵ 林毓生認為，五四時期具有整體性(totalistic)反傳統思想的知識分子，把傳統中國文化、社會和政治看成一個整合的有機體——他們認為真正屬於中國傳統的各部份，都具有整個傳統的基本特性，而這個傳統的基本特性是陳腐而邪惡的。因此，中國傳統被視為每個成分都具有傳統特性的、應該全部摒棄的整合體或有機體。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兼論“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頁173。

³⁶ 戴季陶雖然在新社會的具體社會措施中提出中國古代倫理沒有的新內容，也在1919年8月的文章中，曾經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代倫理理想是「社會主義」，但這不意味著戴季陶以科學或社會主義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古代倫理的價值。在他關於中國古代倫理的基本論述中，均強調倫理本身的重要性，並思考應該如何透過具體措施將這些倫理精神傳承下來。因而中國古代倫理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它符合某些西方文明的標準，而是戴季陶認為它呈現了個體與群體之間適切社會關係的原則。

完成。³⁷在接下來關於經濟變革的討論中，戴季陶將中國放置於世界大勢之中——一方面指出解體中的中國正因商品化而趨近英、美資本主義社會；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罷工亦越趨激烈，中國也身處於世界勞動運動的潮流中——中國的經濟變革因而不僅是中國自身的事務。如此，即使提出了社會改造的理想，但中國仍尚未解決發展工業的種種困難。

四、階級鬥爭

1920年1月2日，戴季陶參加馬路商界聯合總會開新年盛宴，即提醒工商業者，俄國革命的勢力漸漸由西方傳向東方，連過去被認為沒有社會主義的美國，近來罷工的風潮也瀰漫產業界。³⁸另一方面，在1920年2月一篇討論中國勞動問題現狀的文章中，戴季陶亦指出中國社會由於「由外國機器生產品輸入，及國內資本集中的企業組織發達」，中國原先的自耕農、家庭紡織業者、受人身束縛的勞動者等，都漸漸轉向「勞動的商品化」；也就是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法律上的自由人格平等化」，與美國、法國、英國的社會逐漸接近。³⁹如此，中國內部既處於資本主義勞動商品化的過程中，也處於勞動運動風起雲湧的潮流之中。在這個情況下，中國要如何發展工業和改造社會？戴季陶在1920年3月〈勞動運動的發生及其歸趣〉一文中指出：

我們中國現在確是缺乏資本，但是我們中國所缺乏的，卻並不是資
本家。詳細一點說，我們中國國民生活，受著外國大工業的壓迫，

³⁷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二)〉，2版。

³⁸ 季陶，〈新年告商界諸君〉，《星期評論》第32號(上海)，1920年1月11日，2版。

³⁹ 季陶，〈中國勞動問題的現狀〉，《星期評論》第35號(上海)，1920年2月1日，1版。在1919年11月30日的〈現代社會上的自由〉一文，戴季陶透過考茨基的《馬克斯經濟學說》，指出勞動力作為商品和法律意義上的人身自由之間的關係：「商品交換的前提條件，就是商品所有者對於他的商品，非有完全的自由處分權不可。要想使勞動力成為商品，非勞動力所有者的勞動者，成為完全的自由人不可。……正義、自由、平等、友愛的王國，平和幸福的樂土，真是和工銀制的確立，同時出現」。因而，在戴季陶的思想中，自由、平等等英美的法律制度，實以商品化為基礎。參見季陶，〈現代社會上的自由〉，《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上海)，1919年11月30日，8版。

如果我們自己不革除舊日的手工業，代以近代的大機器工業，只是購買外國的機器生產品，中國人的生活，是要破產的。但是我們要組織近代式的大機器工業，卻是缺乏了一樣東西。就是缺乏機器和運動機器的技術。此外土地是不缺乏的。原料是不缺乏的。人工是不缺乏的。只要把上列幾種東西，合成起來，就可以作成近代的大機器工業來。並不是要把上列幾種東西，交給幾個資本家，替他確立上一個所有權，再替他確立上一個身分權，把一切生產機關，都歸他所有，才能作成功近代大機器工業的。⁴⁰

如上述引文，戴季陶認為應該發展技術、科學、工業生產力，但不應也不需接受資本主義的其它制度。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戴季陶同時指出中國本身發展工業的限制：

中國今天是一個資本主義還未成熟的國家，同時是受各國經濟侵略的國家。礦山、鐵路、航權樣樣都被外國資本的勢力壟斷了去，弄到中國人大多數都陷於「世界的工奴」「世界的農奴」的境遇，這都是「資本主義」的罪惡。⁴¹

戴季陶認為，「一定要到各國都廢除了經濟的帝國主義，廢除了資本家的產業組織，廢除了國際間經濟侵略，這個罪惡，才可以免除的」。⁴²換言之，除非廢除世界資本主義，否則中國經濟資源被壟斷的情況，甚至社會改造的方式也都會受到阻礙和限制。例如戴季陶即認為工讀互助團的失敗，即在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所致。⁴³因此，廢除世界性的經濟帝國主義和廢除

⁴⁰ 季陶，〈勞動運動的發生及其歸趣(一)〉，《星期評論》第41號(上海)，1920年3月14日，2版。

⁴¹ 季陶，〈勞動運動的發生及其歸趣(一)〉，2版。

⁴² 季陶，〈勞動運動的發生及其歸趣(一)〉，2版。

⁴³ 季陶，〈我對於工讀互助團的一考察〉，《星期評論》第42號(上海)，1920年3月21日，1-2版。石川禎浩曾比較戴季陶、陳獨秀和李大釗對於工讀互助團失敗的看法——李大釗認為失敗的主因在於城市，因為都市的地皮和房租太貴，要靠資本家給勞動者的工資和商賣小企業的蠅頭，維持半日讀書半日作工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李大釗的解決方法是「採取純粹的工讀主義」，「在鄉下購點廉價的地皮，先從農作入手」。而陳獨秀認為，工讀互助團之所以失敗，是由於參加互助團的青年們缺乏堅強的意志、勞動的習慣和生產的技能；與其說是組織的問題，不如說是人的問題。石川認為，在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文章裏，分別能夠看到他們傾向農村、農民的特性，以及

資本家的產業組織，成為中國社會改造和發展工業的先決條件。

透過提出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看法，戴季陶以此預測世界革命的進行和可能性。在 1920 年 4 月 11 日〈經濟之歷史的發展〉一文，戴季陶探究資本主義的國際性發展如何導致世界形成兩極對抗而構成世界革命的局勢。戴季陶指出，「近代產業是以私有財產、工銀制度、自由競爭三個條件為基礎之集合的財產制」。⁴⁴而近代產業的發展將會透過新地域的發現，科學、生產用具、交通機關、交換方法、分業等方面的進步，從國家經濟進展為超越國界的趨向，形成世界性的兩極分化趨勢：

經濟的治者階級方面，從國家統一主義趨向帝國主義，構成「國際聯合」和「國際戰爭」。經濟的被治者階級方面，從職業的聯合趨向於產業的結合，構成超國家主義之國際的勞動者團結運動。前者的努力，是以個人為基礎，要構成「協作獨占的世界的經濟組織」。後者的努力，是以社會為基礎，要構成「共享的世界的經濟組織」。歐戰就是前者的表現。俄德革命及全世界的勞工運動，就是後者的表現。在這兩個大潮流裏面的我們，人人都非就前述兩個努力當中去任選一條道路不可。⁴⁵

在這兩大潮流中，戴季陶指出資本主義世界性的發展將會導致資本獨佔和國家機關終將破產的命運，「共享的世界的經濟組織」將會是未來的趨勢：

在一方面，隨著交通範圍的擴大，經濟的關係，漸漸由國民的進而為世界的，無論哪一國的物資，不是應世界的需要，不是受世界的供給。並且在這一種大規模的分工協業組織下面，從前那些各個獨立的生產機關，都失了存在的根據。到了這個時代，全世界的經濟組織，已經聯成不可分的關係，從前那種各國家對立的制度，和少數資本家獨佔生產機關的制度，都同時發生破綻。由國家生出的破

對中國人傳統習性的批判；但是，戴季陶從當時社會經濟的角度來分析工讀互助團失敗的必然性，從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方面來看，石川認為戴季陶的水準顯然超過李大釗與陳獨秀。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25-27。

⁴⁴ 季陶，〈經濟之歷史的發展〉，《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上海），1920年4月11日，第13版。

⁴⁵ 季陶，〈經濟之歷史的發展〉，13版。

綻，就是世界主義的趨向。由資本主義生產制生出的破綻，就是社會主義的趨向。在這兩團趨向的當中，國家和資本家這一對同命鴛鴦，存在的理由，都只靠著一個歷史上遺傳下來的惰性。⁴⁶

如此，中國不應該選擇資本主義的道路，不僅因為資本制度(資本家獨占、私有財產權的保障)具有壓迫的性質，而且還由於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發展將會導致資本家獨占和國家對立不敵世界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趨勢。

然而，儘管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了中國道路選擇的理論保證，但不代表世界經濟的趨勢已經可以讓中國自動地進入世界主義和社會主義。戴季陶認為，俄國革命僅是「在世界主義下面，以一國家固有的範圍為起點的革命」，「社會革命不是一國單獨做得來的。倘若全世界不能一致實行同一主義的破壞和建設，這個革命，一定不能完成」，「社會的革命，是要以世界平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⁴⁷

就戴季陶描述的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以及世界一致革命的方式來看，世界革命並非立即可達的目標。首先，若經濟發展的世界性將會造成超越國界的兩極對立形勢，意味著在理論上，中國將會和其他民族一樣，被捲入資本主義經濟而由內部分化為資本家國家機關和平民的兩極。也就是說，中國將會和其他民族一樣依次通過經濟發展的階段，而成為世界兩極分化的部分。⁴⁸即使中國並不情願接納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必然性力量，以及兩極對抗的必然趨勢，卻也意味著中國內部無可避免地會「資本主義化」而產生階級分化。如同 1920 年 6 月戴季陶對於湖州未來生活的預測——「靠家族主義和土地的剩餘價值來維持的紳士階級，

⁴⁶ 戴季陶在這篇文章中詳細地說明了「國家」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戴季陶認為，「國家」的要素應該是土地、人民、國家，但到了現今，國家的三要素被「國家機關」所遮住了；國家機關是政府、議會、司法官，對內的職務是管理人民、榨取租稅，並且透過保障私有財產和身分權的法律，既由有身分有財產的人組織國家機關，也成為資本家生產制的基礎。季陶，〈國家主義之破產與社會的革命〉，《星期評論》第47號(上海)，1920年4月25日，1-3版。

⁴⁷ 季陶，〈國家主義之破產與社會的革命〉，3-4版。

⁴⁸ 在1920年4月11日之〈經濟之歷史的發展〉一文中，戴季陶亦指出「各民族之經濟進化，都是經過相同的過程；各民族之經濟的進化，在時代上和經過上都是互相參差」。季陶，〈經濟之歷史的發展〉，13版。

當(擋)不住以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為基礎的現代新興階級。這是一個歷史的必然的運命」。⁴⁹

此外，儘管在 1920 年 3 月 14 日〈勞動運動的發生及其歸趣〉一文中，戴季陶提及中國在世界中處於「世界工奴」、「世界農奴」的處境，但在其世界革命的觀點中，世界革命是「世界一致」的進行，而非依據地區(民族)分工來界分資本家國家或無產階級民族的角色。指出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在戴季陶的革命規劃中，中國在世界分工的無產階級位置，並不像李大釗所規劃的理論一樣，給中國帶來理論優勢和革命的立即性。在李大釗的想法中，資本主義構成了世界的分工體系，中國處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分工體系中的「無產階級民族」的位置。因而雖然中國內部的工業生產力還未達到「資本主義階段」，內部也沒有數量眾多的資產階級，但世界分工中的無產階級位置即可使中國可以參與推翻世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並且肩負著「世界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⁵⁰但對戴季陶而言，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將使中國形成兩極分化的趨勢，世界革命不會因為一個地區的革命而發生關鍵性的轉變，如同俄國革命也僅是以一國範圍為起點的革命。基於世界一致革命的需要，中國僅是世界革命的參與者之一，並非世界革命的中心。

但可預見的是，中國內部將無可避免地受到世界資本主義影響產生資本家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分化。階級分化的形成不僅意味著中國內部的「資本主義化」，也意味著中國內部產生了階級鬥爭的條件。因而，隨著中國前資本主義的地區逐漸形成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階級分化，戴季陶所強調的和平漸進地進行文化運動和勞動運動，以及同盟罷工的策略，也隨之進行。⁵¹

⁴⁹ 季陶，〈到湖州後的感想〉，《建設》，第2卷第6號(上海，1920.07)，頁14。

⁵⁰ 上述關於李大釗的世界革命觀，參考王遠義對李大釗的分析。王遠義指出，李大釗見到，整個世界既已由因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變成了一個完全整合的體系，於是落後國家或前資本主義社會，皆轉成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某個部分。民族解放運動與中國的發展，遂可以不屬於、不受限於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革命，並可進一步躍升為反世界資本主義的國際運動中，不可缺的一部分。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3卷第4期(臺北，2001.12)，頁503-505。

⁵¹ 在戴季陶來看，文化的定義並不只是文字宣傳的事業，而是「使一個經濟體裡面，

中國處於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潮流的衝突中，歐戰之後在中國產業界同時簇發的新工業計畫和同盟罷工，亦顯示世界潮流的衝突也在中國內部發生，同盟罷工可能在中國會伴隨著工業發展而逐步增加。⁵²

而無論勞動運動或同盟罷工，其意義都包含著勞動者管理和掌握生產工具的生產關係變革。戴季陶指出，勞動運動的目的是「促進勞動階級的團結，以團結的勢力，圖謀勞動者階級的文化發展，造成勞動者自己勞動、自己管理、自己享用的協作共享社會」。⁵³而「同盟罷工」這一名詞，說明「勞動者與資本家的鬥爭」，其目的是「聯合同屬害休戚，從事于生產事業的工人，對於資本家表示反抗，且加以打擊，使其改良待遇工人的條件。或聯合同階級的人，反抗占領生產機關的非勞動者，使其放棄占領和享用收益管理的權利，由勞動者自己勞動、自己管理、自己享用」，具有「階級鬥爭的本意」。⁵⁴因此，在戴季陶的社會革命觀中，經濟的變革已不僅是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還有勞動者掌握生產工具的生產關係變革。

然而，透過對於上海罷工的實際觀察，戴季陶認為由於勞動者知識、訓練、團結都不充分的緣故，中國現行的同盟罷工目的只為要求改良待遇條件，而未到工人占領生產機關的時機。⁵⁵而要增進勞動者知識、訓練和團結，最重要的是生活的改良：

我們要曉得，無論怎樣講精神主義的人，都曉得餓肚皮是餓不出精神來的，疲勞過度的結果，精神是要萎縮的。……我們要希望勞動階級的人，生出一種階級的覺悟，培養出一種階級戰鬥的勇氣，訓練出一種社會組織的能力，一定把他們最低限的生活改善了多少，

大多數不得享受文化利益的人，享受文化的利益」，換言之，也就是「使大多數被掠奪的無產階級，增進消費生產的能力，享受社會物資平等分配的利益，完成各個人身、心、性的自由發展」。因而文化運動不僅應與勞動運動結合，更顯示著戴季陶所思考的社會變革，並非僅只於經濟的層面。季陶，〈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星期評論》第48號(上海)，1920年5月1日(勞動紀念號·第2張)，2版。

⁵² 季陶，〈上海的同盟罷工〉，《星期評論》第48號(上海)，1920年5月1日(勞動紀念號·第3張)，1版。

⁵³ 季陶，〈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2版。

⁵⁴ 季陶，〈上海的同盟罷工〉，1版。

⁵⁵ 季陶，〈上海的同盟罷工〉，1版。

他們的能力才會發揚的。固然，現在我們從事於勞動運動，是用我們的智識和熱心去指導他們誘掖他們，但是他們如果不到自己發出自動力的時候，勞動運動的意義，是生不出來的。空口講話，單想靠幾個智識階級的人，用意志和感情去激發勞動階級的人，利用他們的受動性，以為這樣便可自然生出一個協作共享的社會來。這種空想，是不中用的。⁵⁶

戴季陶另指出：「政治的勞動運動，至少都要勞動者本身的生活改善了多少，欲望增進了多少，他們自己感覺到『由勞動者管理工廠』『由勞動者所有生產機關』的必要，了解這些意義，然後才能發生，著手運動也才有效果」。⁵⁷由此可知，協作共享社會的建立必須透過勞動運動而實現，但並非要求勞動者聽命於指令、受到激發或一時情緒而產生的運動。重要的是勞動者本身的理解、感受、需要和投入，勞動者才能產生自己的力量和意願。如此，勞動者才能真正成為協作共享社會的建立者。

因而，對於戴季陶而言，勞動者掌握生產工具、自己管理的協作社會，自然是生產關係的變革；但在過程中，使勞動者有能力和意願進行抗爭，意味著這亦是一個重塑人和社會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勞動者的悲慘處境以及因其處境所產生的憤怒和決心雖然巨大，但在戴季陶的思維中，並不是建立協作共享社會的真正動力。勞動者反而可能因其理解力不足或情緒使然，被「誤導」而走向錯誤的方向。在此，戴季陶再次強調勞動力量的無方向性以及精英領導的重要，認為「大多數勞動者，理解力和判斷力都很薄弱」，因而革命精英必須負擔政治責任而「為勞動者本身打算」，不僅不能「利用勞動者來求一部分人政治上的目的」，並反對「不切切實的從實際問題著手去努力，把最大多數的階級利害作烏托邦的試驗品」。⁵⁸

⁵⁶ 季陶，〈關於勞動問題的雜感〉，《星期評論》第48號(上海)，1920年5月1日(勞動紀念號·第4張)，4版。

⁵⁷ 季陶，〈關於勞動問題的雜感〉，3版。

⁵⁸ 季陶，〈關於勞動問題的雜感〉，4版。在革命精英與無產階級的關係上，Lenin認可知識分子與羣眾之間的鴻溝，認為只有由職業革命家所構成、高度集中化的政黨機構，將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羣眾運動中，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意識在工人之中的發展，並將其自發鬥爭引導為有意義的政治行動。戴季陶在革命精英與無產階級的能力界分上，接近Lenin的看法，但相信透過精英的引導和漸進的過程，勞動者會

就其實際策略結果來看，從戴季陶的思想可以推知的是，「階級鬥爭」的進行過程是勞動者生活的改善和組織、教育、罷工等相互促進的漸進發展，而不是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政治行動。而在這長期過程中，戴季陶認為一些補救資本制度缺陷的作法，例如協作制度，雖然不能使資本家生產制自然消滅，但卻可以在經濟上對弱者加以補救，並可「養成社員社會的道德和能力」，「使階級的鬥爭，較為緩和而有秩序」。⁵⁹

由上述討論可知，面臨世界資本主義席捲全球、造成兩極分化的歷史必然，中國一方面承受著資本主義對中國內部的改變，一方面因這些改變而具備參與世界革命的條件。然而，在戴季陶的想法中，勞動運動並不僅只著眼於生產關係的改變或生產工具的奪取；更重要的是，勞動者必需在這個過程中，透過生活、智識、能力的各方面改善，逐漸成為協作共享社會的真正建立者。因此，生產力、生產關係仍舊在戴季陶的社會革命中佔據著基礎和關鍵的角色，但這些經濟層面的變革，既維繫在勞動者必需具備的意願、知識和能力之上，而勞動者物質生活的改善，又是這些能力發展的基礎。因此，唯有在生活、制度和人的能力同步、逐步變革，才能造就健全的人和社會。而主導著這個過程進行的，是負擔著政治責任和策略

由自身產生自發性，而主動追求協作共享社會的建立。另一方面，戴季陶的社會革命觀中，革命精英無需「向羣眾的智慧學習」。在這個角度上，戴季陶思想中的革命精英並不同於民粹主義者(populist)，後者處在知識分子的啟蒙角色與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向羣眾學習的矛盾當中。而民粹主義相信羣眾革命潛力的觀點，則是毛澤東思想的特色之一。上述關於Lenin、民粹主義和毛澤東的討論，參見Maurice Meisner, "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

in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84, 90, 94-99.

⁵⁹ 季陶，〈協作制度的效用〉，《建設》，第2卷第5號(上海，1920.06)，頁8-12。Arif Dirlik指出，戴季陶雖然拒絕資本主義，但仍對於權力移交給勞動階級心存疑慮，尤其懷疑將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實現此一權力轉移的手段。就上述1920年戴季陶幾篇最「激進」的文章來看，戴季陶確實認為勞動者的知識、能力均不充分，因而反對無產階級直接奪取政權的政治行動。然而，就戴季陶對於「階級鬥爭」一詞的用法，「階級鬥爭」指涉著勞動者對抗資本家、勞動者奪取生產工具、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革命意涵和必要性；因而，培養勞動者的道德與能力，是勞動者奪取生產工具的前提條件，也是實踐「階級鬥爭」的一環。只是，以培養勞動者的能力為前提，加上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社會革命無法於一國之內完成，戴季陶雖然提出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必然性與必要性，但卻成為長遠的、非現階段所能達到的目標。Arif Dirlik,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28.

規劃的精英，而非尚無理解力和判斷力的勞動者本身。在戴季陶從個人到世界、從經濟到非經濟整體關聯的社會革命觀中，新社會的建立只能是一條漸進的漫長道路。

五、不同的道路

Arif Dirlik 認為，許多五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唯物史觀中所尋求的，是對於支配新文化運動思想議題的解答——中國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中，發現對於思想、價值和社會組織的功能性解釋，它加強了新文化運動認為傳統價值和制度已經不適合當代中國的論據。也就是說，這些馬克思主義論者認為，當生活的物質基礎改變時，舊的價值就失去了他們的功能，而讓位於更適合新社會維持手段的價值。因此，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直接影響，是藉由提供一個經濟層面的社會進化，鞏固並豐富了當時更為盛行的達爾文主義的變革觀。⁶⁰

透過「經濟層面的社會進化」的理論假定，戴季陶和李大釗均指出「因經濟基礎變動，道德亦隨之變動」的結論。⁶¹然而，在這共同點之外，兩人對於中國傳統倫理的看法、新社會倫理的方向等並不相同。而除了這些不同點，兩人卻也共同地指出，在經濟基礎變革的重要性之外，建立新社會的過程中，改造人類精神和道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基於強調經濟變遷是社會變遷基礎的共識，李大釗與戴季陶都認為中國傳統倫理有家族制度和農業經濟為基礎，也認為「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⁶²然而，對於建立在大家族制度基礎上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李大釗與戴季陶的評價並不相同。李大釗認為：

⁶⁰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34-35.

⁶¹ 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19年12月），收入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112。

⁶²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1920年1月），收入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145。

孔門的倫理，是使弟子完全犧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的義務的道德。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餘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因他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⁶³

因此，就李大釗的觀點來看，雖然外國工業對於中國農業經濟的破壞，使「全國民漸漸變成世界的無產階級」；⁶⁴但另一方面，伴隨著農業經濟崩潰，也產生了打破「大家族制度」、打破「孔子主義」的運動、解放個人權利和個性的歷史契機：

原來中國社會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團，個人的個性、權利、自由都束縛禁錮在家族之中，斷不許他有表現的機會。所以從前的中國，可以說是沒有國家，沒有個人，只有家族的社會。現在因為經濟上的壓迫，大家族制的本身已竟不能維持，而隨著新經濟勢力輸入的自由主義、個性主義、又復衝入家庭的領土，他的崩頹破滅，也是不可逃避的運數。……中國的勞動運動，也是打破孔子階級主義的運動。孔派的學說，對於勞動階級，總是把他們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階級的犧牲。……現代的經濟組織，促進勞工階級的自覺，應合社會的新要求，就發生了「勞工神聖」的新倫理，這也是新經濟組織上必然發生的構造。⁶⁵

在李大釗的思路中，不論就農業經濟和家族制度的崩壞導致孔門倫理失去基礎，還是就中國傳統本身的壓迫性質來看，中國傳統應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因此，相對於戴季陶給予中國古代倫理極高的評價，認為隨著物質越進步，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卻越陷入不幸的看法，李大釗則指出資本主義既壓迫中國，同時將中國於傳統中解放的兩個面向。

但戴季陶和李大釗基本上均同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或解放力量)將

⁶³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頁145。

⁶⁴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頁147。

⁶⁵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頁148-149。

使中國傳統家族制度不復存在，中國勢必將建立新的物質基礎和社會關係。戴李兩人均強調未來社會需要新的倫理，但對於新社會倫理的看法並不一致。戴季陶強調中國古代倫理在新社會中再現的可能，而李大釗寄望於階級鬥爭結束之後人類普遍互助精神的實現。對於李大釗而言，互助精神是「社會的本能」：

人類為抵抗他的環境，適應他的周圍，維持他的生存，不能不靠著多數的協力，群合的互助，去征服自然。這協力互助的精神，這道德心，這社會的本能，是能夠使人類進步的，而且隨著人類的進步，他的內容也益為發達。⁶⁶

然而，這普遍的人類社會所共有的互助精神，卻因為「建立於階級對立的經濟構造的社會，那社會主義倫理的觀念，就是互助、博愛的理想，實在一天也沒有消滅，只因有階級競爭的經濟現象，天天在那裏破壞，所以總不能實現」。⁶⁷因此，在李大釗的思想中，階級鬥爭和人道主義的理想在獲致後歷史共產主義社會同屬重要性，但社會革命的過程中，是有實踐上、時間上的先後順序；換言之，隨著最後的階級鬥爭結束壓制互助精神的經濟構造，而人類互助生存的世界，就可以透過「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而實現。⁶⁸由於互助精神是存在於普遍人類社會的道德，可以推論的是，在經濟變革之後，實現互助精神的新中國社會，將會是普遍的人類未來社會的一部分。⁶⁹

⁶⁶ 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頁104。

⁶⁷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1919年9月)，收入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34。

⁶⁸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493-496。

⁶⁹ Maurice Meisner認為，在1919-1920年，透過世界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性觀點，李大釗對於中國傳統有了與過去不同的看法，尤其以Marx的異化觀點，描述所有前社會主義倫理均反映了人與其自身的異化。Meisner認為李大釗排除中國傳統價值的的要求，與其「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和世界社會主義秩序即將到來的預期，實為一致。相較於李大釗此時的國際主義傾向，戴季陶的「互助」思想則有不同的來源。1919年6月的〈對付布爾什維克的方法〉一文，戴季陶也曾提及中國人具有平和、互助的精神：「我們中國人是從古以來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我中國從古以來對於社會組織就是極力排斥『自利』，贊美『利他』的。我們如果把中華民族『利他』的精神恢復起來，把『科學的精神』來做肥料，我們這樣大的一塊土地，這樣多的人民，真可以做成一個理想的『平和國家』，理想的『互助社會』。」從行文

但對於戴季陶而言，未來中國新社會中所實現的新倫理，應該依據中國古代倫理精神而轉化創造。中國古代倫理原本有其家族制度和農業自給的經濟基礎，但因為經濟變遷，社會制度和農業經濟遭受破壞而無法支持古代倫理的措施。但戴季陶認為，中國一方面需接受資本主義的機器工業生產力，但同時以自身的歷史素質修正當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倫理敗壞的弊病。基於戴季陶指出倫理的標準就是「適於全人類之社會的生活與否」的問題，⁷⁰以及描述中外無產階級因經濟壓迫而過不上倫理生活的相似處境，也意味著中國透過自身古倫理精神而提出針對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的新社會方案，或者也對於其它同樣承受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的社會有所幫助與啟發。

但在中國走向不同方向的新社會之前，仍需經過社會革命的過程，而戴李二人也表達了社會革命進行的不同方式。李大釗強調階級鬥爭以變革經濟結構之後，再進行改造人類精神；而戴季陶將勞動者的生活改善視為第一要務，強調在這一基礎之上，培養勞動者的智識、能力和發展組織，使勞動者的改造和經濟組織、社會改造同步並進。這意味著戴季陶並未如同李大釗一樣，將經濟結構變革與改造人類精神視為社會革命過程中的先後議程，而是將之視為相互作用的辯證加強過程。因此，對於戴季陶而言，勞動運動因而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還有重建人和社會的意義。

雖然經濟變革與道德變革的順序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戴李二人均在經濟變革之外，強調精神改造和道德秩序的重要性。在李大釗的想法中，透過最後的階級鬥爭造成的生產關係變化，從前壓抑互助精神的經濟構造解除了，人類精神的改造和互助精神的實現才有可能性；但李大釗亦不認為新社會的倫理精神，會自動地隨著經濟構造的變化而產生：

到了經濟構造建立于人類互助的時期，這倫理的觀念可以不至如從

來看，戴季陶並不是從「普遍的人類社會特質」來討論利他、互助的精神，而僅就中國人、中華民族所具有的精神特質來討論。季陶，〈對付布爾什維克的方法〉，《星期評論》第3號(上海)，1919年6月22日，4版；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83-185.

⁷⁰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上)〉，《星期評論》第20號(上海)，1919年10月19日，1版。

前為經濟構造所毀滅。可是當這過渡時代，倫理的感化，人道的運動，應該加倍努力，以圖剷除人類在前史中所受的惡習染，所養的惡性質，不可單靠物質的變更。這是馬氏學說應加救正的地方。⁷¹

對於李大釗而言，人類理想的社會並不會隨著最後的階級鬥爭結束而自動實現，而是必需在「過渡時期」以人為的努力改變惡習染才會達到。⁷²對戴季陶而言，更認為「古倫理的破壞，是他本身的崩壞，並不是因我們的破壞。我們的責任只是在新倫理的建設」。⁷³

換言之，兩人都同意，若人們沒有在本身作道德上的改變，或主動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規範，則一個改變了經濟基礎的社會，並不會自動地成為一個更好的社會。若沒有新的倫理和道德的方向，經濟基礎的改變雖然關鍵，但仍是不完整的。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剷除人的惡習而恢復互助精神，或是界定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倫理關係，都取決於人的主動和創造。如此，在經濟結構變革必然進行的前提下，戴李二人均保留了人的主動性的領域；而這個領域的特殊之處，是肯定人類建立道德秩序的能力。人因而不是經濟變遷的被動載體，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實踐道德的行動者，並且負擔著社會革命的真正責任。⁷⁴

⁷¹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頁35。

⁷² 王遠義指出，李大釗受陳博賢的影響，視馬克思本人過度偏向經濟決定論，故試以茅原「靈肉一致」、「心物兩面」的改造的思想，以及克魯泡特金「互助」的思想，來補救馬克思主義的不足之處。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493-494。

⁷³ 季陶，〈舊倫理的破壞和新倫理的建設(上)〉，2版。

⁷⁴ 上述關於李大釗與戴季陶強調社會改造過程中精神、道德的重要性，主要參考Erich Fromm對於Karl Marx的批評。Fromm指出，對於人類激情(human passions)複雜性的低估，導致了Marx思想中三項最危險的錯誤。其中第一項，就是他忽略了人類的道德要素。Fromm指出，由於Marx認為在經濟的改變獲得實現時，人類的善會自動確立；但他沒有理解到的是，如果人們沒有經受自身道德上的改變，則更好的社會並不會到來。Marx並不關注，至少未明白表示關注，一個新道德方向的必要性；而如果沒有新的道德方向，則所有的政治與經濟變革均是無益的。因此，從上述Fromm對Marx的批評來看，戴季陶和李大釗均以其各自的方式補充、修正了Marx的觀點。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264.

六、結語

1920年中，戴季陶離開上海到湖州小住，感受湖州這樣一個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還保有從容、安詳、悠閒和自然的生活；然而，戴季陶也同時感傷著這樣一個自然悠閒的社會，將逐漸難以抵擋上海的繁華以及西方文明的眾多商品。⁷⁵面對田園詩般的中國前資本主義社會受到外來資本主義商品制衝擊而瓦解的痛苦，戴季陶在文章中發出沉重的嘆息；然而，他同時認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瓦解、城市取代鄉村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趨勢。

外來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社會的衝擊，首先造成了大量失業的出現和傳統倫理、社會關係的喪失。在資本主義發揮影響力的地區，失業群眾構成新的、盲目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問題，而中國美好傳統倫理和社會關係的喪失更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異己和墮落。資本主義摧毀了中國的舊世界，但未能帶給中國一個新的世界。基於經濟變遷的必然性，中國必須接受工業而重建解體的社會。然而，中國進行工業化面臨著種種困難，且工業化的社會也不是一個具有適切社會生活的社會。因此，戴季陶試圖以人為介入的方式重構非經濟領域與經濟基礎的平衡，試圖將中國傳統社會中理想的、倫理的一面，轉化為適應機器工業物質基礎的未來社會制度。在外來資本主義的鐵蹄下，戴季陶欲重建的中國社會仍舊保留中國的性質。

而中國古倫理中的仁愛精神可作為新社會關係設計的參考依據，也意味著中國古代倫理精神能夠提供比當前西方資本社會更具適切社會生活的設計理念。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當時中國無能抵禦物質進化的浪潮，在浪潮中落後於西方國家並承受資本主義摧毀倫理和社會關係的痛苦；但透過古老道德精神的傳承轉化，透過人的主動介入和設計，物質落後的中國將能夠提供一個既古老又新穎的倫理基礎，以修正資本主義社會已顯露出的缺陷和不足。如此，被許多五四知識分子視為有機整體，需為中國處境負責而應全盤捨棄的「中國傳統」，在戴季陶眼中，卻有一些重要的部分提供了修正當前工業社會弊病的制度設計資源。

這一點是戴季陶有別於五四反傳統思潮和李大釗之處。根據歷史的經

⁷⁵ 季陶，〈到湖州後的感想〉，頁1-16。

濟解釋，李大釗也認為農業經濟和家族制度是中國傳統道德的基礎；並且隨著資本主義的衝擊，農業經濟和家族制度的崩壞使中國傳統道德不復存在。然而，基於「孔門倫理」對於個人個性、自由的壓制，李大釗認為資本主義一方面帶給中國經濟上的苦難，另一方面卻幫助中國自傳統中解放。因而未來中國新社會的道德，將不會有「孔門倫理」置喙的餘地。未來社會的新倫理，是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互助精神，在壓制它的經濟制度廢除之後，經過重新培養而恢復為新社會的倫理基礎。因而，在李大釗的社會革命觀中，中國社會經過資本主義到達社會主義的未來，將會是取消中國傳統特質而融入普遍人類社會的過程。

然而，資本主義仍是中國社會改造的阻力。從資本世界化的理解，戴季陶推導出世界平民一致對抗國家和資本家的世界革命觀點，以及資本主義和國家必然消亡的樂觀理論結論。然而，既然世界兩極分化是必然的趨勢，意味著中國也不可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影響，如同湖州不可避免地遭受商品化的破壞。另一方面，儘管中國內部的階級分化使階級鬥爭成為可能，但戴季陶並非依靠中國勞動者在世界分工中的悲慘處境而獲得革命優勢，也不認為應立即進行奪取政權的政治行動。生產工具的易手僅是社會革命目標之一，更重要的是精英引導勞動者生活、智識和能力的增進，使勞動者有能力負擔重構社會的任務。戴季陶的社會革命因而不僅是增進生產力、改變生產關係的經濟變革，還包括重塑人與社會的長期改造。

由上可知，透過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源而同樣強調經濟結構變革，但戴季陶兩人的社會革命策略和未來社會規劃卻指向不同的方向。在新倫理界定的議題上，中國的特殊性質在戴季陶的社會革命觀中被發揚，而在李大釗的社會革命觀中被消融。在社會革命的規劃中，經濟結構的變革在李大釗來看是必須優先進行的革命議程，但戴季陶卻認為改造人與改造社會需同時漸進地進行。而在不同處之外，戴季陶兩人卻都認為光是經濟結構變革並不足以建立一良好的社會，而強調培養人的道德能力和建立倫理秩序的重要性。

如此，戴季陶的社會革命，在經濟變革必然進行的前提下，一方面試圖轉化中國傳統資源而修正工業社會的缺陷，以回應資本主義；另一方面，

透過強調人的道德能力和建立道德秩序的可能性和責任，以回應馬克思主義。而戴李兩人社會革命觀的不同之處，更指向不同策略的可能性。1920年之後，五四時期的各種思想逐漸經歷政治實踐的試煉，戴李二人也走上既聯合又分裂的道路。然而，如何回應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來自蘇聯的馬列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卻持續在往後的革命過程中，困擾、詰難著國共兩黨的革命者。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史料

李大釗著，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Li, Dazhao, zhu, Zhong guo li da zhao yan jiu hui, bian zhu. *Li da zhao quan ji (di san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6.

《建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影印。

Jian sh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0, ying yin.

《星期評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影印。

Xing qi ping lu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1, ying yin.

《民國日報·上海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影印。

Min guo ri bao, Shanghai b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1, ying yin.

(二) 專著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Lu, Fangshang. *Ge ming zhi zai q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gai zu qian dui xin si chao de hui ying (1914-1924)*,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89.

范小方、包東波、李娟麗，《蔣介石的國策顧問戴季陶》，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

Fan Xiaofang, Bao Dongpo, Li Juanli. *Jiang jie shi de guo ce gu wen dai ji tao*, Beijing: Tuan jie chu ban she, 2011.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Shichuan, Zhenhao, zhu, Yuan Guangquan, yi. *Zhong guo gong chan dang cheng li shi*,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2006.

陳曾燾著，陳勤譯，《五四運動在上海》，臺北：經世書局，1981。

Chen, Zengtao, zhu, Chen Qin, yi. *Wu si yun dong zai shang hai*, Taipei: Jing shi shu ju, 1981.

-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Dirlik, Ari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Fromm, Erich.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 Perry, Elizabeth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 Wood, Ellen Meiksins.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三) 期刊、論文

-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3卷第4期(臺北，2001.12)，頁477-513。
- Wang, Yuanyi. "Li da zhao dao ma ke si zhu yi zhi lu," *Ren wen ji she hui ke xue ji kan*, di 13 juan di 4 qi (Taipei, 2001.12), 477-513.
- 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兼論“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 Lin, Yusheng. "Wu si' shi dai de ji lie fan chuan tong si xiang yu zhong guo yi shi de wei ji: Jian lun 'wu si' jing shen, 'wu si' mu biao yu 'wu si' si xiang," *Zhong guo chuan tong de chuang zao xing zhuan hua*,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2011.
- 李占才，〈五四時期的戴季陶〉，《黃淮學刊(社會科學版)》，第3期，(商丘，1992.03)，頁41-48。
- Li, Zhancan. "Wu si shi qi de dai ji tao," *Huang huai xue kan (she hui ke xue ban)*, di 3 qi (Shangqiu, 1992.03), 41-48.
- 郭聖福，〈五四時期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研究〉，《學術月刊》，第9期(上海，1990.09)，頁73-78。
- Guo, Shengfu. "Wu si shi qi dai ji tao dui ma ke si zhu yi de jie shao he yan jiu," *Xue shu yue kan*, di 9 qi (Shanghai, 1990.09), 73-78.

孫語聖，〈淺析戴季陶「馬克思主義」兩重觀之原因〉，《咸寧師專學報》，第20卷第5期(咸寧，2000.05)，頁20-22。

Sun, Yusheng. "Qian xi dai ji tao 'ma ke si zhu yi' liang chong guan zhi yuan yin," *Xian ning shi zhuan xue bao*, di 20 juan di 5 qi (Xianning, 2000.05), 20-22.

劉文麗，〈馬克思主義還是社會改良主義——再論五四運動後戴季陶的政治思想〉，《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第5期(北京，2009.05)，頁1-5。

Liu, Wenli. "Ma ke si zhu yi hai shi she hui gai liang zhu yi: Zai lun wu si yun dong hou dai ji tao de zheng zhi si xiang," *Shou dou shi fan da xue xue bao*, di 5 qi (Beijing, 2009.05), 1-5.

Mast III, Herman. "Tai Chi-t'ao, Sunism and Marxism during the May Fo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Modern Asian Studies*, 5:3 (1971.07), 227-249.

Mast III, Herman and William G. 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1 (1974.11), 73-98.

Meisner, Maurice. "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 in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Tai Chi-t'ao's Theory on Social Revolution, 1919-1920

Shih, Chun-chu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ai Chi-t'ao's theory on social revolution and its specific features between 1919 and 1920. In line with dominant Marxist discourses at that time, Tai believed that adapt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s crucial to social revolution.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Tai pointed out that the disintegr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was caused by capitalism. Under the impact of capitalism, unemployment became a prominent phenomenon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were lost.

According to Tai,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ety must build upon an economic foundation of accepting the industrial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is prerequisite, a new form of social relationship could be establish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Moreover, capitalism has already caused class polarization in China. Therefore,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workers, enlighten them and invigorate their organization. These conditions would give workers the propensity to change the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this essay, I articulate two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ai's theory. Firstly, Tai provided a blueprint to fix the flaws of Western capitalism usi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Secondly, despi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being a key point in bringing about a social revolution, it is not the panacea for all China's problems. Tai argued that one's moral a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reconstructing ethic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also crucial in 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revolution in China. For the above reasons, Tai Chi-t'ao proposed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China which

responds not only to capitalism but also to Marxism.

Keywords: Tai Chi-t'ao, social revolution, Marxism, ethic, Chinese tradition